

修道人與制服

洋泥

兩年前去荷蘭看鬱金香花展，在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海中，突然間出現了十幾位穿黑衣、戴白帽的修女，爲此引起周圍人們的一陣騷動。我與同往的台灣朋友也覺得很驚訝。因爲修女們也這麼老大遠來「趕場」，且還穿著在花中顯得格外耀眼的會服！

西方很多國家，雖然在物質主義之下，人們穿衣越來越緊跟時時在變的「世界時裝新潮流」，但仍有很多神父和修女們穿著「不合時潮」的制服在大街小巷裏走著。這對於我這個來自大陸的學生來說，幾乎又是夢裏的事了。因爲我父母輩心中的神父修女，真是這種永遠穿制服、讓人肅然起敬的形象。而生在「文革」中的我，卻早已習慣了大陸「微服出訪」的神父、修女了，除了在教堂裏外，平時尤其是大城市裏的神父、修女，他們走在人群中，要不是早認識，誰能一眼看出他們是修道人？到了西方後，我又聽說這裏的聖召很少，因此願意再穿這些似乎是「過

去那個時代」的制服，就需要加倍的勇氣。我過去甚至還有意去找「老外」神父、修女朋友們探討這個問題，可仍是沒能找到滿意的答案。因為這些獻身給主的修道人，都覺得這根本不是個問題。我就只能繼續尋找。直到動筆寫這篇文章時，才突然間覺得恍然大悟。

在我的記憶裏還存著一個難以忘懷的鏡頭：九零年復活節，我在華沙看見一個穿棕色會服的年青修士在街頭行走，他看來是那麼安詳寧靜，為此我忍不住停下了觀光者匆匆的腳步，目不轉睛地站在街頭望著他，直至他再次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當時由於波蘭政府的變動，波蘭的錢幣每天在貶值，街上已出現大量個體經營的銷售西歐產品的「精品店」，而公立百貨商店售貨員的態度仍使人想起大陸來。整個波蘭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人心惶恐。人們好像暫時什麼都失去了，為此擠火車時也那麼粗暴，由於我不懂波蘭語，因此走到那裏，只聽見人們不停地在叫喚，沒有任何耐心，當時的波蘭人給我的印象是只信美元！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修士的形象。

我們的修道人、我們的教友，敢在無神論者中間公開表明自己信天主教嗎？這是我想在這裏提出的問題。

長期以來，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的爺爺奶奶父母輩不敢在無神論的同事中、朋友中間，公開承認自己是天主教徒。為此，在大陸，對教會圈內人來說，對「外教人」特別敏感；對不信教的人來說，對「天主教徒」也過於敏感。這除了政府有關政策限制以外，是否也與我們個人的信心有關？因為我們太怕被別人誤解，太怕「多事」。為

此，長期來，我們的教友們往往可能有兩副面孔：一副面孔，對外教人說外教人的話；另一副面孔，對教內的人說教內人的話。我們好像都是在做外交家，見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語言。這即使在已出國留學的大陸教友學生中也不例外。在海外，有時偶遇台灣、香港來的學生，見他們不分場合在中國學生聚會中大聲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且還向不信教者認真傳教，有時我們心裏真既被他們感動又為他們擔心。因為我們大陸人在「圈外」還是不會這樣的。我們大陸人好像更欣賞西方人存有的一種觀點：「信仰是個人的事」。如果不是把我們迫到「忍無可忍」時：比如說在單位裏黨支部書記勸我們入黨；比如說共產黨員朋友對我們考合資企業時一定要取下脖子上戴的十字架；比如說當外教人在拼命攻擊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的天主教時。我們的教友們在無神論者中間，一般還是「忍」字當頭，不會主動亮出教友身份來的。

在大陸，天主教徒過去有個統計數字佔人口千分之三，為此我們是「少數民族」。且由於我們還不敢像佛教、基督教那樣大聲傳教，因此我們還是一個「弱小的少數民族」。可我們真的甘願永遠做這樣的「弱小民族」下去嗎？

很多年前有一天晚上，在北京某電影院看電影，看見幾個佛學院的小和尚遠遠坐在離人群很遠的最靠邊一排，由於他們的光頭和袈裟，因此印象特別深刻。可我們大陸的神父、修女坐在北京音樂廳裏聽威爾第的《安魂曲》時，要不是我們教友們早在主日進堂時就已認識，否則誰

能說這個穿黑色中山裝或西服的人是我們的主教或本堂神父或修女？！我說這個的意思，並不是主張我們的神父、修女出門時一定要穿制服或戴羅馬領；但怎樣使人從外表看出他/她是修道人？我想這是一個當我們在探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教會時，可以借鑒討論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神父、修女時時刻刻都穿著制服，佩戴十字架，是不是能對越來越物質化的世界產生抗衡作用？——「我們是信天主的！」

現在既然國家倡導宗教自由，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怕在堂外傳教。雖然政府可以明文規定在大專院校中不許慶祝西方的復活節、聖誕節之類，但當教友們被允許在堂內慶祝時，我們是否可把教堂大門開大一些？學學中國的和尚們，不怕進香者可能的不敬；學學西方的教友們，把教堂的大門向旅遊者敞開、向音樂工作者開放。

話說回來，向無神論者敞開我們的心腹有時是痛苦的，尤其是對經過這麼多「革命運動」的中國教友來說。因為他們本來就不信，而我們就是吃了這麼多苦還信。他們真能理解並寬容我們嗎？可如果想想沒有我們母親的陣痛，怎麼會有一個新生兒的誕生呢？

現在的大陸教會，由於政府的鼓勵和影響，往往在教會裏太注重宣傳「天主教模範人物」對社會所做的各種實際貢獻，卻不太敢大張旗鼓地強調信仰的力量。為此有時候看到、聽到這麼多由教會所辦的慈善事業，難免讓人們覺得教會仍擺脫不了「被利用」的命運。我們是可以大量辦教會所附設的外語學校，我們是可以辦工廠，我們是可

以辦醫院診所等，可我們辦這些教會事業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我想這是國內那麼多熱衷於多為政府群眾辦事的神父、修女和教友們，在忙碌工作後應該靜下心來深思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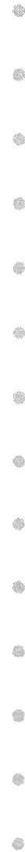
在《新約》中有講到，瑪爾大為伺候耶穌忙碌不已，她甚至還想叫正在聽耶穌講話的妹妹瑪利亞來幫助，主回答她說：「瑪爾大！瑪爾大！你爲了許多事操心忙碌，其實需要的唯有一件。瑪利亞選擇了更好的一分，是不能從她奪去的。」（路10:38-42）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家陸震九三年十二月廿九日曾寫了《虛偽：當代中國的精神黑洞》一文投書《公共關係導報》，作者指出：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最大的損失是精神的衰敗與墮落，當代中國人的最大精神缺陷是虛偽。他認爲當今的中國存在的「制度性虛偽」，必然在全社會範圍內大規模地產生假話和虛偽，而這種普遍的虛偽又以忠順擁戴的外表而得以強化，以至形成「一個結越來越緊的惡性循環」。這裏我想說，在我們的大陸教會裏是否也存在著這種姑且說是「被迫的虛偽」？！我們教友如何從我做起去改良它？

宗懷德主教一九九四年春，《在李瑞環主席與全國宗教團體領導人物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就是參與，就是服務、就是貢獻，在參與、服務、貢獻的過程中，體現我國宗教的價值」。爲此，我們的教友是否也該多考慮一下精神文明建設上的參與、服務和貢獻呢？而不僅僅停留在更多是物質文明上的參與、服

務和貢獻。我們固然是要為社會「多做善功」，但我們是否滿足於停留在「服務社會創佳績，愛國愛教做貢獻」和「宗教界愛國人士」的層面上就夠了呢？

魯迅先生一九二七年在香港的一次演講中說到：「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想這對我們在探討建設中國人自己的教會時也是適用的。我們不要一個象徵性的教會，我們要建設一個有「真的聲音」的教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與世界各地的教會一起共融在主內。



洋泥：目前正在歐洲留學的中國大陸青年。